

王壯元集

王壯元先生詩卷之十六

詩五

出版年史

李瑞良 編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中國編

【上卷】

次公

次公

次公

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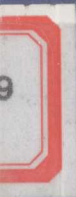
次公

次公

次公

次公

次公



懷舊集卷上

顧雲鴻

向大成

魏浣初

徐錫祚

孫朝肅

郭際南

顧雲鴻

版史

出年

國編

中

李瑞良 編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上卷】

邵濂十首

徐濟忠十一首

魏冲十首

孫森二首

顧大武六首

君字朗仲中應天鄉試屢上春官
立欲以名教是非自任監司府縣
懷室去城十八里有孫氏廢園曰藤溪君得而樂之居其中教授生徒而已少而讀書以四几周其身堆書及棟埋頭于中劣得隙光映字累月不出戶五經三史略皆上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出版编年史/李瑞良编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5

ISBN 7-211-04683-X

I. 中… II. 李… III. 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
IV. G23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158 号

中国出版编年史(上、下卷)

ZHONGGUO CHUBAN BIANNIANSHI

作 者: 李瑞良

责任编辑: 雷 戎

电子邮件: raylong@sina.com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电 话: 0591-7533169(发行部)

印 刷: 福州屏山印刷厂印刷

地 址: 福州市铜盘路 278 号

邮政编码: 350003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0.375

字 数: 74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1-04683-X/K · 376

定 价: 49.00 元(上、下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含英咀华 钩玄提要

——《中国出版编年史》序

戴文葆

我很高兴，在疗养中拜读了李瑞良先生的新著《中国出版编年史》校样，上面散发着书香和油墨的清香。文中论述引用的文献资料，丰富而恰当，含英咀华，释义准确，读来使我更加领会其周密性，从而有助于理解如何观察出版脉络，认识源流。这不仅不是作者几十年积累学术资料的成果，更是从事编辑出版实践长期钻研的心得。我多年注意阅读瑞良兄的论文和专著，一面为自己获得教益和激励而欣喜，同时对瑞良兄三四十年来坚持出版研究表示衷心的敬佩和祝贺！

记得他早就研究了我国图书编纂的创始阶段和图书生产的萌芽时期，研究了图书怎样生产和流通。他行文表述问题，不以艰深吓唬读者。他长期在出版界供职，编书、审读、研究，有大量的业绩在，从不屑于强弄个什么名义来装扮自己。他是谨严而又散淡的学者！

瑞良兄治古代编辑出版史，从没有肆意剥夺孔子、司马迁在研究古代文化中的地位。他曾指出：孔子曾经多次谈到尧舜禹的

政绩，说明孔子看到过许多关于他们的历史资料，熟悉前代的历史事实；没有足够的资料，孔子是不肯轻信的。这在《论语》的《为政》、《八佾》、《述而》、《泰伯》、《卫灵公》等篇章里都有过说明。孔子西观周室，看到大量典籍和制度，才赞美道：“郁郁乎文哉！”孔子是个博览群书的学问家。瑞良兄还指出：不论孔子删诗之说能否成立，司马迁看过许多古书，在《史记·五帝本纪》篇末说：“其所表见皆不虚。”对于“百家言黄帝”云云，典籍简策，官守其书。太史、太祝、太卜及太师，是上古文化的守护、整理、编纂、传播者。官师合一，知识只限于在贵族内部传授，学术文化为王室贵族所垄断，其后才出现私家之学。这部出版史把图书编纂的源流讲得清清楚楚，读来令人深感警示的命意。讲论出版史者，如果与子路持有同样的“何必读书”的论调，只能成为孔子所斥责的“佞者”了。

这部出版史称编年史。编年体是书籍最早的编纂体例，有优点也有缺陷。记事难免割裂，行文可能枯燥。瑞良兄这部编年体通史，内容结构有明显创新突破，既便于全面扼要叙事，又不妨碍明确纪年为主，是革新体例的可喜佳构，良史运思的重要收获。全书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至清前期、晚清、民国，计八卷，还冠以“反映源流、探寻脉络”的前言。前言首先界定“出版”和“编辑”的概念内涵。图书制作的方式不应局限于印制，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的手抄本传播的历史，不应排除在出版史之外。编辑工作可以追溯到上古甲骨文时期，凡以资料或作品为工作对象的编纂活动，都可以纳入编辑范畴；与出版史相交叉的学科，也须酌情对待，给出版史读者以比较完整的印象。本书的前言，不仅说明编撰体例问题，而且通过叙事即已阐明学术观点，实际上是增强本书的学术

性了。

在每一卷里，写有两部分，先是“总叙”，后列出版史实。例如秦汉时期，“总叙”称“秦汉是中国古代编辑出版史的奠基期”。秦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在古代出版史上是新时期的开端，首先统一了文字，结束诸侯割据、文字异形的紊乱局面。汉代开始有了最早的字典和词典。特别是造纸技术的提高、笔墨生产的改进、挟书禁令的废除，政府采取积极的文化政策，重视图书的聚集和校理，刊刻石经，设官整理四方征集来的书籍，为国家主持的编校事业开辟了途径，更为古代目录学、校雠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书籍贸易活动有了萌芽。综论文化发展大势之后，按年代顺序跳跃式地分述秦汉各代出版文化事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三国分立，五胡乱华，政治经济文化动乱纷争，是古代出版事业的曲折发展时期，按各国各朝跳跃分述出版事迹。到明代至清前期，是古代出版史的全盛时期，“总叙”讲明大势后，同样分别摘记其出版文化大事。各卷体式，依出版事业盛衰轻重，统一而又酌情分别去取，这是编年体的灵活运用和开拓。

作者在叙述最早的图书创始情况时，不因上古传说时代考证编年的困难而退避不言。如《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后来儒家指“河图”、“洛书”为《周易》、《洪范》两书的来源。《左传·昭公十二年》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其后历代阐释大多为论者的臆说，但这些却正是我国古代文献记录下来的古书名。先民终于进入文明境地，从结绳记事到传说伏羲制作八卦，正是中国原始时代最早出现图书的一种向往和反映，不宜置若罔闻。最初的编书人，哪里能像现代人站在台上信口开河那么容易啊！

《中国出版编年史》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郑重推出，作者籍隶闽中，这都使我想起出生于莆田的史学家、具有批评精神的郑樵（1104—1162）来。他不应科举，居夹漈山上，刻苦力学三十年，访书十年。他学识渊博，编纂《通志》，其中的“二十略”具有创见，《艺文略》、《校讎略》、《图谱略》等，有关编辑出版工作，而以《通志·总序》中的“会通”思想最为重要。他在总序开篇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他说得太艺术化了，此后谨守旧辙的学人不能领会。只有清代很会读书、善于评论的章学诚是他的知音。《文史通义》卷五《申郑》说：“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遣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在学术界一直受屈的章学诚挺身为他抱不平，指斥“学者少见多怪，不究其发凡起例，绝识旷论，所以斟酌群言，为史学要删，而徒摘其援据之疏略、裁剪之未定者，纷纷攻击，势若不共戴天。古人复起，奚足当吹剑之一映乎！”章学诚在《校讎通义》卷二评论最概括：

“自刘、班而后，文艺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竟源流。”

我以为瑞良兄体会乡前贤之长，以自身数十年研讨实学之功，既利用传统体裁，又同时立意求新，文献材料处理适当，结构形式酌予发展，撰成历代出版工作演进的编年史巨制，弭前修之不足，勉后进之向学，令我拜读而嘉叹。往岁我等有幸常因中国编辑学会而得聚晤，西趋襄樊武当，北至镇扬京华；江湖秋

水，电脑传书。得闻早岁艰苦力学，以慰慈母辛劳抚育，务实贡献社会。念我多年切磋聆教，匆促间奉呈读后粗疏杂感，翘首南天，为之汗颜。谨请作者暨读者诸君批评指教！

2003年7月4日于北京和平里

反映源流 探寻脉络

——《中国出版编年史》前言

李瑞良

这部编年史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动笔，时断时续，头尾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当时执笔编撰的动机，可以说是出于资料积累的启发。积累资料是我长期养成的习惯。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初期读大学时，我就喜欢积累学术资料，但当时的专业兴趣是中国学术史、思想史。从 50 年代末起，由于工作关系，我开始留心并搜集编辑出版资料。由当代而近代，而古代，逐步溯流探源，形成了一条纵线。与此同时，我很自然地注意到横的积累，即与中国出版史相交叉的邻近学科。到 80 年代中后期，办理了离休手续，有了空余时间，我就着手把多年积累的资料进行整理。编写中国出版编年史的念头就是在这情况下萌生的。但由于其他文字工作的羁绊，编写此书的工作断断续续，进度缓慢。近两三年来，才决心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现在总算脱稿付印了。

中国出版史作为一门学科，如从清末民初叶德辉《书林清话》算起，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学术研究成果从无到有，逐

步增多。但是，全面深入研究中国出版史，还需要更多更大的努力。研究这门学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特别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研究中国出版史，必然要涉及多种学科。本书编写过程中，就遇到了一些疑难之处，既有学术观点问题，也有编撰体例问题。

首先，“出版”和“编辑”的概念内涵如何界定？这涉及本书的内容范围。“出版”是一个现代词语，《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是：“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这就是说，出版的对象或前提是书刊、图画，出版的方式方法是编印。台湾《中文大辞典》的解释是：“著作人以其著作物交付发行人担任印刷发行曰出版。”这里有著作人、著作物、发行人和“印刷”及“发行”等项。二者比较起来，“著作物”的范围更为广泛，但一个说“编印”，一个说“印刷及发行”，前者没有提到发行，后者没有提到编辑。看来，《中文大辞典》的解释有点狭隘片面。由著作人“交付”给出版者，这是一般情况，但也有不是由著作人交付的特殊情况。例如，出版社主动找到一部古籍，无论是抄本或印本，拿来出版，也不是没有。只提“印刷及发行”，没有“编”，也就是没有提到编辑工作，不如“编印”来得全面。不过，另一个问题是，按照这两部词典的说法，出版必须经过印刷。那么，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依靠手抄流传的历史，算不算出版史呢？前些年学术界就有过争论。我们认为，“出版”含有三个要素，即：图书或著作物、制作和传播流通。具备这三要素的都可视为出版。制作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手抄就是其中一种，不应局限于印制。手抄传播在中国历史上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不应把它排除在出版史之外。“出版”的“版”原指印版，但“出版”作为一个惯用语，可以也应该从广义上理解，不必拘泥于字面含义。

至于“出版”有没有包括编辑工作在内，这在实际上是不成问题的。出版单位不同于承印公司，来稿要经过审阅选择以至于加工整理，这也早已成为事实。“编辑”一词是古老的词语。《辞源》的解释是“收集材料，整理成书”，《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比较完善：“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编成书刊。”可知编辑工作是从资料（或作品）变成出版物的中介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编辑工作可以追溯到上古甲骨文时期。考古发现，安阳殷墟甲骨是分类窖藏的。甲骨文是一种原始文字档案，窖藏的目的在于保存备查，不是为了传播流通。但这种分类工作是一种文字整理工作，可以说是编辑工作的萌芽。

古人把著述活动分为“作”和“述”两类。“作”是著作，“述”是“编述”。前无所承，由我始撰的叫做“作”；有所凭借，但加以编次加工的叫作“述”。《礼记·乐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又《中庸》：“父作之，子述之。”《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集注：“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孔子认为他所做的删《诗》、《书》，定《礼》、《乐》等古籍整理工作，只是“述”，不是“作”。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自称他编撰的《史记》只是述，不敢以作者自居：“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后汉王充更把著述分为作、述、论三类。“论”的本字作“侖”，是集合很多简册，加以排比编辑的意思。他自谓其《论衡》一书只是论，不是述，更不是作。（见《论衡·对作篇》）今人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综合古代论述，把著述分为三类：一是著作，二是编述，三是抄纂。三者有高下深浅的不同。今天看来，编述和抄纂都带有大量的编辑成分，不应排除在古代出版史的范围之外。就“编辑”的内涵而言，本书所持的观点是，凡以资料或作品为

工作对象的编撰活动都可纳入编辑范畴。例如，古代的史书编撰，无论是正史或野史笔记，大都以实录或前人著述为原始资料或依据，自应择要收入本书。丛书、类书、选集、总集，以至文人别集等，也都应包括进去。但历代别集数量太多，本书限于篇幅，基本不收。丛书、类书和选集等也只记其较重要者。

其次，与出版史相交叉的学科也很复杂。研究出版史的横向范围，关键在于对“编辑”一词的理解。编辑整理的目的是使资料或作品成为可供传播的图书，从这一点出发，与编辑学相交叉的传统学科可以从几方面来看。一是文字学、训诂学和注释学。文字形体直接关系到书写和雕印、排印的字体，训诂和注释又是原文的附加部分，带有明显的编辑成分。二是校讎学、版本学和目录学。这些学科都是围绕图书的编辑、制作和流通而形成的传统学科，与编辑出版史是分不开的。三是翻译学、传播学。不同文字的互译意味着图书传播范围的扩大，不能排除在出版史之外。

又次，如何掌握编年史的体裁，也有一些值得斟酌的问题。编年史不同于通史，必须以年为纲，以事系年，这是它的特点。但这种体裁的局限性在于容易把完整的历史事件（包括编印活动）割裂分散，因为历史事件往往是跨年代的。同类的事物也需要联系其前因后果，或追寻源流沿革，力求完整。因此，本书在记述中注意对事件作必要的延伸。举例说，绘制地图是图书编撰的一个重要项目。在明末利玛窦带来西洋绘制地图法之前，中国就有绘制地图的传统。但有的年代无考，即使有年可考，也不必一一记叙，只能选择其有代表性的事例，并加以延伸追叙。本书选择晋代地图学家裴秀制《禹贡地域图》和元代朱思本制《舆地图》为代表，并在记述他们的事迹时注意联系此前和此后绘制地

图的情况，追源溯流，联成一线，给读者以较完整的印象。这就是本书凡例所说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

出版史实的年代包括出版机构的创建时间，图书的编撰时间，刻印、排印时间，出版事件发生的时间，以及编辑家、出版家的生卒年等。如何使用各种时间，也需斟酌。本书选择时间的基本原则是：出版机构创建时间可考的，记其创建时间；创建时间无考的，选载其刻书较早的时间，连带介绍其刻书活动情况；图书编撰时间跨越年份的，或系于始编之年，或系于编成之年，视情而定；刻印时间无精确记载的，依据有关资料推断其约略年代，刻印时间无考的，系于刻印单位之下；重要的编辑出版家事迹系于卒年或在世时间，其所编刻的重要图书，择要专项记述，可能与事迹有重复之处，但详略不同。

另外，编年史属于记叙体，主要是叙述史实，一般不作评论。重要的人和事，必要时在文末点明其在出版史上的作用及意义。为了节省篇幅，本书文字力求简略。需要引证的重要引文放在正文之后。

应该指出，在本书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各方面直接间接的支持。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蒙中国编辑学会领导刘杲同志和戴文葆、邵益文、吴道弘诸公的盛情邀请，我多次参加了该会召开的中国出版史研究座谈会，得到很大的鼓励和启发，促使我决心完成这项编撰计划。最近，戴文葆先生得悉拙稿即将付印，在疗养期间慨允赐序，为本书增光，至为感荷！福建省新闻出版局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大力支持，及时列入出版计划。责任编辑雷戎同志在策划选题过程中得知拙稿即将完成，积极争取出版，主动协助寻找资料，并细心审阅，还增补了一些内容，在这里一并致谢。

当然，个人学识肤浅，加上年老体衰，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独力编撰此书，难免挂一漏万。错讹不当之处，势所难免，尚祈专家和读者指教。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正在主持编撰多卷本的《中国出版通史》。我忝列编委之一，愧无所为，现将这部编年史呈献给编委会，如有可参考之处，那就不胜荣幸了。

2003年5月

时年八十二

凡 例

一、本书记述范围

(一) 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二) 直接影响图书生产和流通的历史背景和重大历史事件。

(三) 历代重要典籍的编撰和整理，包括儒家经书的编撰和注释校勘，道家著作的编撰，佛经和古兰经的翻译和编撰，中外文互译，少数民族文献与汉文书籍互译，重要的总集、选集、类书、丛书和辑佚书的汇辑，以及石经刻制等。

(四) 图书的物质载体、物质材料和制作方式，包括手写、传抄、雕印、活字印刷、石印、铅印和彩印等。

(五) 历代重要的出版机构，包括政府有关机构，重要书坊、书局和私家刻书者及其所出图书，以及历代重要的编撰家、校勘家、考据家和出版家的事迹等。

(六) 图书流通，包括历代政府的图书文化政策和管理措施、图书流通方式和渠道、图书售卖发行、书价演变、版本源流、典籍聚散和公私藏书以及中外图书交流等。

二、记述的时间跨度

上起先秦，下迄 1949 年。

三、编撰体例

(一) 根据中国出版史的发展脉络，全书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至清前期、晚清和民国八卷。

(二) 各卷先作总叙，概述该时期图书生产和流通的基本情况 and 特点，然后以年为纲，以事系年，由点到线，由线及面，力求叙事完整全面。叙事按年代先后排列。年代指图书的编撰时间、刻印出版时间、出版机构创办时间等，视情而定。无确切年代可考者，排在相近年代或所属朝代之末。编撰家、校勘家、出版家的事迹系于卒年，生卒年无考者系于所编书籍年代。

(三) 清以前以年号纪年为主，括注公元纪年；民国时期以民国纪年为主，括注公元纪年。

(四) 重要的原始资料及材料来源需要引证者，附于正文之后。

目 录

上 卷

凡例/1

先秦卷/1

秦汉卷/51

三国两晋南北朝卷/103

隋唐五代卷/161

宋辽夏金元卷/237

下 卷

明至清前期卷/407

晚清卷/635

民国卷/737

参考文献/951